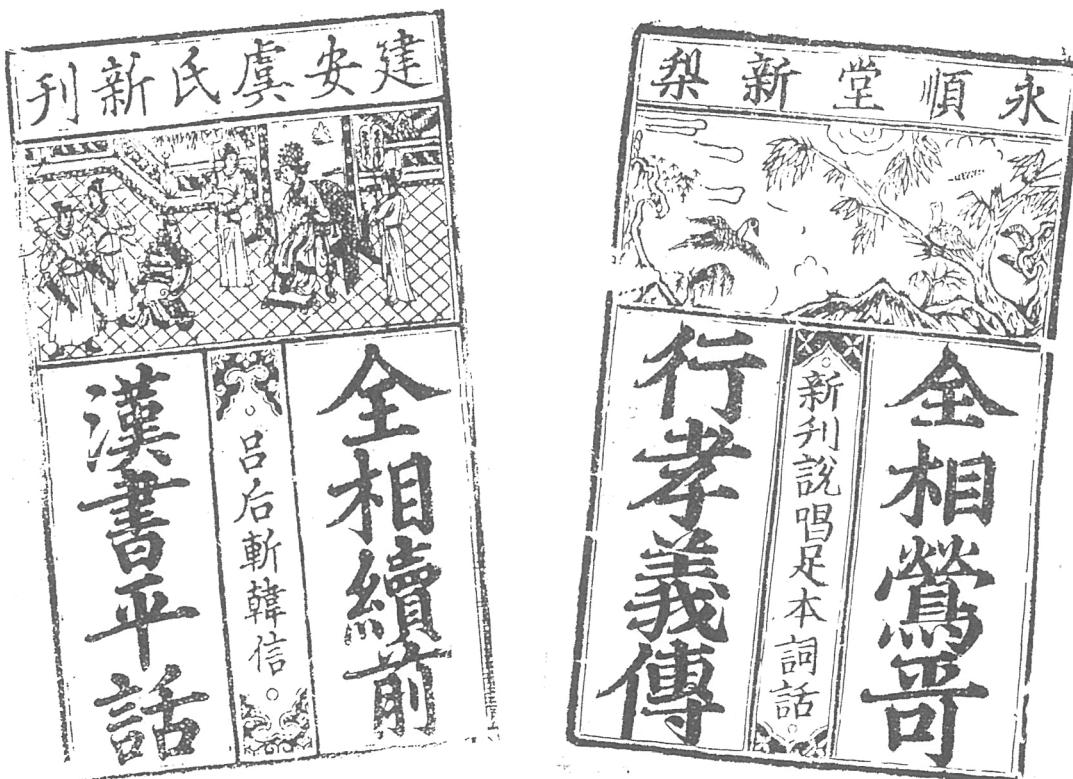


明成化本說唱詞話刊於北京說 獻疑



明朝成化年間（1465-87年）說唱詞話書影

賈二強

（陝西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1976年在上海嘉定一座明代墓葬內，發現了一批明刻本古籍，經整理後知道這是一批從未著錄的說唱文學作品，因其多數有明成化年間刊印碑記或題識，即定明為明成化本《說唱詞話》（以下省稱《詞話》）。此事轟動一時，以致有人譽為「是第二個馬王堆的發現」。後北京文物出版社於1979年以《明成化本說唱詞話叢刊》之名影印發售，遂廣為世人所見。這一發現在文學史上的價值及意義，時賢已多有宏論，此不贅及，然研讀之餘，於此《詞話》刊刻地點的論斷則不無疑竇，茲略陳管見，以就教方家。

一、

關於此《詞話》的刊刻地點，最初的研究成果已將其定為北京。^①以後從無人提出異議，時至今日，似已成定論，各種論著均持此說。此說的惟一依據，是《詞話》中《新刊全相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卷首僅殘存上半部的內封面，從右至左橫刻有「北京新刊」四字。然對此本稍加審視，相信如曾目見元建陽書坊至治間刊《全相本話五種》（以下省稱《平話》）^②原面者，一定不會感到陌生，此《詞話》與其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首先，從內封面看起。《平話》中有四幅，^③同類內封面《詞話》中有六幅。^④這兩類間頗多雷同：構圖均分上中下三段，上段自右而左橫署「××新刊」，中段為圖，下段書名；前者作豎三行，書名大字分列左右，中間一行略窄；《詞話》內《張文貴傳》、《鶯哥孝義傳》全同前者，其餘的下部書名部分作五行，中間三行同前者，惟在左右多出一副概括書中主要內容的對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者書體的結體用筆亦近似，一些細部處理如四周雙邊、書名部分，中間一行皆以上下相向的花魚尾做修飾等亦無不同（見左圖）。

再看內文。《平話》五種皆為元明建陽書坊此類通俗讀物的典型格局，為上圖下文，即俗稱之「兩截版」，《詞話》中《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出身傳》與之相同；^⑤二者圖皆為橫通滿頁，主要人物向左，右部豎題圖名；書名均貫上下邊欄，占

^① 見趙景深〈談明成話刊本《說唱詞話》〉，《文物》第11期，1972年。

^② 上海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1956年。

^③ 分別在《新刊全相本話武王伐紂書》、《新刊全相秦併六國平話》、《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和《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卷首。

^④ 在《新編說唱全相石郎駙馬傳》、《新刊全相唐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新編說唱包龍圖斷歪烏盆傳》、《新刊全相說唱張文貴傳》、《新編說唱包龍圖斷白虎傳》及《新刊全相鶯哥孝義傳》卷首。

^⑤ 其餘諸種則皆為圖單占半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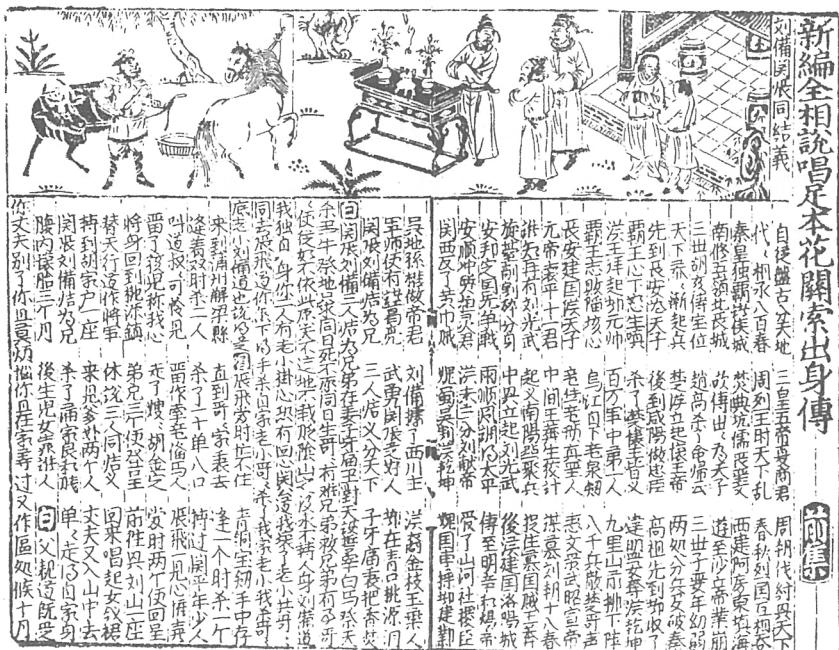
二行，正文細行密字；文內「詩曰」、「白」等作橢圓形陰文。尤其是刻書用字，《平話》書名大字爲顏體而圓活，《詞話》雖略顯生硬但仍屬同一體，正文則均屬草率，並多用簡



筆別體（見上圖與下圖）。

一、

這南北相距幾千里兩代相去幾乎一個半世紀的不同刻本間如此之相近，絕非偶然。宋人似已注意到其時不同地區版刻風氣的不同，因而有杭本、蜀本、建本的說法。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對雕版印刷應用較爲普遍的宋元時期的版刻研究方面，從雕版印刷相對發達的浙江地區入手，使之條理化，版本之學從此開始擺脫純經驗型，走上科學研究的道路。以後其門人趙萬里先生更光大乃師的學說，依據不同地區的版刻風氣將宋刻細分爲以江浙杭州爲中心的浙本、以四



川眉山為中心的蜀本、以福建建陽為中心的建本，以及北方金人統治下的山西平陽的平水本。這種宋金不同地區刻本在字體版式等方面具有不同風格的研究結論已為學術界普遍認同。降及蒙元，雖然版刻風格趨向同一，但此種地區差異依舊存在，尤其是建本和平水本。《平話》即為元建陽書坊所刻通俗類民間讀物的典型風格。入明以後相當長時間，建本仍保留著自家的獨立傳統，未受或很少受到其他地區風氣的影響。

上文所提到的內封面，首先見於元至元間建刻《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⑥及稍後的《平話》中，是同時期建陽書坊版刻的一種風氣。^⑦在明前期，建陽書坊繼承了這一風氣，此外其他地區未見這種手法。而為書籍加刻內封面，實至明後期萬曆時方廣為各地使用。裝飾用魚尾下加「o」的辦法，始見於南宋建本，到元代成為建陽書坊的普遍習尚，是元及明前期建本的典型特徵之一，而極少見於同時的其他地區刻本。書名行占雙行，正文細行密字，除建刻通俗讀物及同時的平水本所採用外，其他地區亦極為少見。《平話》及《詞話》的那種與南宋建刻一脈相承的刻書字體及多用簡筆別體，也是元明建刻通俗讀物的獨特風格，這一時期，其他地區刻書多用當時流行的趙體字，與《詞話》大體刻於同一時期，並同屬通俗讀物之弘治間北京書坊金臺岳氏所刻《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就是如此，一望而知與建刻截然不同（見右圖）。又《詞話》內《新編說唱包龍圖公斷歪烏盆傳》卷末有陰文題識「成化壬辰歲季秋書林永順堂刊行」一行，而自稱書林是元明時建陽書坊的風尚，至明嘉靖尤其是萬曆時方見於書肆漸多的蘇州、南京、杭州、徽州等地，北京有明一代書坊稀少，未見有自稱書林者；《詞話》印書用紙為竹紙，^⑧而當時除建本外他處多用棉紙；《詞話》中《白兔記》一種為南戲，理應流行於南方，而《詞話》出土地恰在江南：凡此也均可做為其為建陽刻本而不當刻於北京的有力佐證。說到這裡，可以斷言，這種刻版風格只能出於建陽書坊，《詞話》的刊刻者永順堂為明前期建陽書坊勿庸置疑，惟不如虞氏務本堂、劉氏翠岩精舍、劉氏日新堂、鄭氏宗文堂及余氏諸堂等知名而已。



^⑥ 見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1990-1994年。

^⑦ 流傳至今的又有至正間劉氏翠岩精舍刻《廣韻》；至正間博文書堂刻《禮部韻略》；余氏勤德堂刻《十八史略》等。

^⑧ 見趙景深文。

三、

至於書中有「北京新刊」字樣也不足爲怪，這本是建陽書坊的一貫做法。此種習氣建陽書坊古已有之，如現存多種南宋建刻《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 × ×》之類之自言「監本」，而這種「纂圖重言重意互注」的本子實出建陽書坊之發明創造，如何可能來自太學國子監之「監本」；南宋以降多種建刻《京本 × ×》等之自言京本，而其實多爲彼地書坊的自編自撰。今傳《元刊雜劇三十種》內有多種書名冠以「大都新編」、「大都新刊」、「古杭新刊」，王國維先生在論及此事時云：

題「大都新編」者三，「大都新刊」者一，「古杭新刊」者七，又小字二十六種，大字四種，似元人集各處刊本爲一帙者。然其紙墨與板式大小大略相同，知仍是元季一處匯刊。其署「大都新刊」或「古杭新刊」者，乃仍舊本標題耳。^⑨

趙萬里失察，將其中的《古杭新刊的本關大王單刀會》誤作杭州刻本，^⑩余多年前師從當代版本名家黃永年先生攻研版本目錄之學，先生曾指明其誤，謂審其版刻風格，必出建刻。至王氏所言匯刊者實亦爲建陽書坊，題「大都」、「古杭」者，亦未必盡如王氏所說於一仍舊本，實是建陽書坊抬高身價以促銷的手段。正如今日各地店家推出「北京烤鴨」的招牌，而食客不必過分在意此鴨是否真產於北京一樣。

^⑨ 《古今雜劇三十種敘錄》，影印日本影刊元本，1924年，按此《雜劇》又有影印原刻本，收入《古本戲曲叢刊四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85年。

^⑩ 見《中國版刻圖錄》第四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年。按或以爲分刻於北京杭州各地則更謬（如張秀民所說，見所著《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